

革命故事



革命之火

楊尙儒等著

7.81

3

星 星 之 火

楊尙儒等著

作 家 出 版 社

一九五九年・北京

內 容 說 明

這本書里的四篇故事，都是作者的亲身經歷，反映了紅軍时期的农民暴动和兵变。“为了土地”記述了陆海丰起义軍六連的成长过程。“两当兵变”追記了在甘肅两当，由习仲勋同志领导的兵变的实况。“沸騰的才溪”把福建才溪农民暴动的曲折经过生动地写了出来。“星星之火”反映了閩西的农民武装，在缺衣无食的环境下，在山里坚持革命斗争的情况，作者写下了当年苦斗的英勇事迹，也把許多烈士的形象活生生地送到讀者的眼前。

革 命 故 事

星 星 之 火

楊 尚 儒 等 著

顧 生 岳 等 插 圖

*

作 家 出 版 社 出 版

(北京东總布胡同22号)

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57号

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發行

*

書号1279 字數22,000 開本787×1092 1/32 印張1 $\frac{1}{16}$ 插頁5

1959年4月北京第1版 1959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數00001—30,000冊

定 价：(2)0.15元

目 次

为了土地.....	陈 江 (1)
两当兵变.....	石 磊 (11)
沸腾的才溪.....	刘 忠 (17)
星星之火.....	楊尙儒 (24)

为了土地

陈 江

1927年3、4月間，几个乡公所的狗腿子，挟着閻王眼，象催命鬼似地搖搖擺擺，又来催捐款了。这一次，我和陈龙、陈进龙、陈河和陈坤五个人就沒等他們进村，在村东头揍了他們一頓，这几个家伙扔开眼本就逃跑了。我正高兴地拍着陈龙的肩膀，突然从我背后走来一个人，高高的个子，消瘦的下巴，黑黑的鬍碴子。他向我瞅了几天，又想向我們說什么似的，笑嘻嘻地慢慢走近我們，

“小伙子，有志气，你們打得妙！”

这下可把我們弄楞了，他是什么人，我疑惑地望着他，象沒听見他說什么似的。他走到我跟前，拍着我的肩膀，我盯着他不覺后退了一步。

“兄弟！咱們是一家人。你們光在这几个人身上出气，撈不到飯吃。我們要打倒土豪，分到土地才有飯吃，你們說对不对？”

“对呀！……”我刚說了半句，却看見陈龙脸色一变，向我递过来一个眼神。我轉过身来一看，有两个“民团”背着枪搖搖晃晃的走来了，我心想又不知誰家遭殃啦！这时，那个陌生人却已經往村子里走去。我凝望着前面

的村庄，他那大个子、消瘦的下巴和密密的短鬍碴我記得一清二楚，可他叫什么名字哩？我正想着，一个“民团”已走到我面前，吆喝道：

“喂！他媽的，領老子去陳家村去！”

我一听是到我們村里去，心里又跳又恨，我咬着牙齒，向陳龍他們四人擠了一眼，說：

“老总，我們当兵你們要不要？”

一个小个子“民团”，斜着头，从眼毛縫里瞥了我一眼，悶着肚子，从鼻孔里嗯了一声，把槍朝地上一蹬，“人也沒有槍高哩！哼！”

“咱們打賭，輸了就請吃粑粑。”其实我个子真沒有槍高。

这个小个子“民团”，眯着眼望着我，把槍向我一推，双手一叉腰，說：“要賴，老子要你命！”

站在身旁的一个瘦个子“民团”，把槍倚在身上，双手往胸前一搜，嘴張着象木魚，想吃粑粑哩！我接过槍，立即后退了一步，把槍口对着他。这时，陳龍也从瘦个子“民团”身旁夺下了槍，这两个家伙蒙头轉向，顫抖着举起手，吓得縮成一团。我看了又好笑又好气，这些平时专欺负穷人的狗腿子們，現在在我們穷小子面前也得低头了。

“你的粑粑輸給我們了！”我瞪着这两个家伙，“再来，老子要你命！”

这两个家伙鬼鬼祟祟，象个受惊的兔子似的跑了。

我們四个人，輪換地背着枪，心里又高兴，又紧张，不知怎么是好。陈龙比我大两岁，今年二十一岁，可沒有我个子高。他的两个眼烏珠一轉，点子就出来了，嘴一尖說：“我們赶上那个陌生人。”

我們赶到东山，也沒見这陌生人的影子。天黑了，滿山树叶沙沙发响，好象到处有人追来似的。“我們找到了一个山洼里，在草堆上躺下了。

“陈龙，你再算一算看，这个陌生人在哪里。”我打趣地問他，不覺打了个噴嚏。陈龙眯着眼看着我，鼻子一縮，說：“敌人一定进村抓你去了！”

“你別瞎說。”

“你不是打了个噴嚏。”他摆弄着指头，装得真象个算命瞎子，把大家逗得抱着肚子笑。

我們五个人紧挨着，不一会我听得陈河呼呼地睡着了。我翻来复去，好象滿身刺痒似的睡不着，心想，我父亲給地主当了一輩子牛馬，死了連块葬身地都沒有，一样的人，为什么人吃人，这样不平。心里火辣辣的，怎也睡不着。这时，躺在我身旁的陈龙，翻过身来，輕輕地碰了我一下，說：

“你在想什么哩？”

“我那块地，你知道长得不坏，我們一家人苦干了一年，白給地主干了，这有什么盼头，年年空欢喜，年年两只脚支着个空肚子，为土豪当牛馬……”

“說这些有什么用，全怪你的命不好。”陈龙呶了一下嘴說。

“命不好？难道我祖祖輩輩的命都不好？不！……”我想着。陈龙見我没回答，爬起身来，看了我一眼，停了一会兒，若有所思地說：“我看那个陌生人，倒象个共产党！”他压抑着低沉的声音：“上次，村里唱戏，有一个人坐在我身旁，和这个陌生人差不多高的个子，是的！我記得他嘴上也有一圈黑鬍碴子，他对身旁几个小伙子說什么打土豪，分土地，又說穷人只有团結起来，才能从土豪手里夺回自己的土地。他还說，土地是大家的。他的話真有道理。后来这个人不見了。我問东头大爷，大爷也摸不清，只說他的話有道理，可能是共产党，多奇怪呀！如果这个陌生人真是共产党，咱們就有盼头啦！”

我們正談得起劲时，突然树蔭里窜出八、九个人，向我們直扑过来，吆喊道：

“站住，不准动！”

我們慌忙端起枪，眼前一片漆黑，被电筒光照得眼花撩乱。我手里的枪已被一双手夺过去了，心里直跳。

这时，一个人喊道：“把这些‘民团’狗腿子捆起来。”他們七手八脚的捆着我，可我心里反倒平靜下来，他們也和我一样恨那些“民团”狗腿子。我跌跌撞撞不知跟他們走了多少山道，也不知东西南北，心里也不知想些什么。只記得在一棵黑古隆洞的大树旁轉了一个弯，前面又一

陣墨黑，連天上的星星也看不見了。這時，我發現前面有一堆火光，隱隱約約有一堆人圍在那里。他們見我們走近時，都站起來瞪着眼睛，想把我們吃了似的。

我站在前面，在火光里，見一個高个子想向我發問，這個人好面熟，可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覺得這是不可能的。這個大个子走近我跟前，打亮電筒照在我臉上，我使勁的睜着眼，直盯着他，可我怎么也看不清他。他照了我一下，又急忙照了陳龍他們四人，然後，他走到我跟前，解開了繩子，熱烈地擁抱着我說：“我們是自家人，同志們！”

我們四個人也高興地說：“原來是你！”原來他就是我們白天遇見的那個陌生人。雖然我們還不知道他的名字，但我們知道，他也是個窮人。他扶我走到火堆邊坐下，我兩只眼睛直楞楞地盯着他，又好象不相信自己眼睛似的，可是，我又不知怎的象小孩子見到母親那樣，不覺倒在他懷里，我流淚了，同志們也流淚了，我立刻覺得我眼前是那麼亮堂，整個世界都屬於我的了。

他擦着我的眼淚。第一次喊了我一聲：

“革命同志，哭還行！”

我抬起頭，是那樣聽話。

“我們都是革命同志啦！”一個小伙子站到我跟前，指着大个子，說：“這就是我們的王區委書記王德田同志。”我仔細地凝視着他。他是王區委書記！他的臉在火光中閃閃發光，就象一盆火炭，使我心里那樣熱乎。

这时，陈龙走上一步，两只眼睛老瞅着这个矮胖的小伙子，象是要从他脸上找出什么似的。

“認識我么？”那小伙子問。可陈龙象沒听见似的，紧紧握着手，凝視着他。

“……不！是在一次唱戏时，我好象听你說过，我們要團結起来打土豪分土地……”

說着，把大家逗得哈哈大笑，在我一生中再也沒比这时更高兴的了。

王書記見我們家常話摆个不完。他一边撫摸着我們剛繳来的两支枪，一边插嘴說：

“来講講你們的枪吧！”他望了我一眼，意味深长地說着：“这枪上有故事，土豪拿着它，迫我們繳租子，要我們的命；現在枪到了我們的手里，我們要拿回土地，要他們的命。枪是我們的命根子。”

我小时候就喜欢枪，記得那时候我用木棍做了一枝枪和人家打仗，現在头上还有一个伤疤，可現在才真正有了枪，才是我真正的命根子，我要用它从土豪手里夺回自己的土地，讓爸爸的阴灵知道，在他兒子手里，夺回了自己的土地。王区委書記，象知道我的心思似的，望着我，微笑地向我点了一下头。

七月的一天，天沒大亮，我們就起来了。可是十三个人，总共只有五支大枪。太阳刚冒出山头，王区委書記就叫我把枪捆在甘蔗里。我一边捆一边想，这是干什么，打

仗就打唄！弄这个干什么。我眨了眨眼，正想問时，看見王書記完全变了样，他穿了一件挑担背心，戴了一頂破旧草帽，說：

“我們在上午十点鐘，赶到惠青公路关口市鎮，按計劃行动。”他見我疑惑地望着他，似乎专对我說着，“要沉住气，不准暴露身份，按我咳嗽三声为行动口号。”

关口市鎮上，有几家酒鋪子，地方虽不大，可挺熱鬧，卖甘蔗的，卖柑桔的，卖粑粑的，排在公路边足有半里路长。公路上来来往往行人不断，小摊上的生意显得格外兴隆。

我們一行十三个人，有的扛着甘蔗，有的挑着筐子，来到市鎮上。我們五六个人按計劃插在小販摊中間，其余几个人各按計劃活动在市場上。我放下甘蔗，不声不响地插在小販中間，东张西望的假装卖甘蔗，可偏巧这时来了个牵馬的商人，专找岔子似的，一上来就摆弄着我的甘蔗：

“啥价錢？”

“五角，要不要由你。”我有意不耐煩地說。这个商人呕着气，二話也沒說就到另一个摊子上去了。我悶着肚子笑，其实一捆甘蔗也不过五角錢。

这时，一百来个“民团”从前面来了。我心里不觉紧张起来，一想起王書記的話，又馬上板下了脸。

前面几个“民团”，瞅了我們一眼，便匆匆忙忙走过去

了。后面一伙“民团”又陆陆续续上来了，劈头几个家伙抢了我几根甘蔗就啃，头也不回的走了。我心里直冒火，要是往常我真要上去给他个苦头吃吃。

过后，后面又稀稀拉拉来了十三个“民团”，摇头摆尾地走来了。领头担着筐子的王区委书记，走到我跟前，向我看了一眼，拿起一根甘蔗就咬了一口，并转向后面来的几个“民团”喊道：

“好甘蔗，老总吃吧！”

这时，我们六个人抢先迎上“民团”，叫卖：

“甘蔗甜，不甜不要钱，买一根送一根。”叫卖声闹成一片，十来个“民团”跛着脚，把枪搭拉在身上，伸手就抢着来挑甘蔗。王书记见时机已到，就吐出一口甘蔗，象吃呛了似的，咔！咔！咔！连咳了三声。坐在酒馆里的五个人，扛着甘蔗出来了。我们乘机夺过枪。

“不准动！”“民团”见五枝枪顶着他们，老老实实举着手缴了枪。我们正押着这十三个家伙，在乱哄哄的人群里走时，前面人群拥挤过来，不一会来了两个骑马的“民团”，一个象官长模样，另一个象是卫兵，直撞过来。我们急忙退到人群后面。见王书记瞄准了那官长，“啪！啪！”这两个家伙应声倒下了。我们抢过两支手枪，在人群里押着几个俘虏撤退到城門后面，沿着城沟，向东面山上去

了。

这一仗打得真有意思，我从心底佩服王书记。我不时

地偷望着王書記，見他把嘴一尖，說：“这叫諸葛亮借东风。”老陈听他这么一說，就跟着从鼻孔里哼出了一段“草船借箭”，可把大家逗乐了。前面有一个小伙子，吵嚷着：“妙极了，諸葛亮借箭，我借枪。”說着，笑着，我們走过了山崗。

这时，发现前面駐地有一帮人群向我們迎来，我們馬上藏到兩側埋伏。只見領頭的是个六十来岁，头发花白的老头，后面跟八九个小伙子，那个老头突然不見我們了，便东张西望，不断地摸着头喊道：

“喂！喂！……”

突然，王書記站起来，走上前去，大爷又惊又喜，向王書記扑来，在他胸前撫摸着說：

“你还認識不？那次唱戏，你的話句句打进我心眼。”他指着后面的七、八个小小伙子，“来呀！我們都是自己人，一条心，打土豪，分土地。你知道我老头兒，六十多啦，快死了，連葬身地都沒有。”

我們也都跑过去，和他們拥抱着。这位大爷的嘴唇微微顫动，象是要說什么，可是又一时不知从何說起。我凝視着大爷，忽然想起我父亲臨終時說的話：

“我死了，把我埋到东山上去，你祖父沒留下一块地。我这一輩子，你也看到我半輩子了，我拚死拚活为着你爭一分地，可是孩子，你別怪爸爸，我对不起你。你要为你下一代爭一分地，你孩子也会說，这是爹留下的……”

他死时还要土地，他死了还没有自己的土地，我忍着，我不知什么时候掉泪了。

大爷放开王書記的手，轉向我，說：

“哭！我哭了一輩子，快死了，還沒哭到一分土地。沒出息！要握緊槍……”

他的話音那樣硬，上眼眶也濕了。

大爷和我肩并肩走着，誰也沒說話，可我覺得我們是一個心眼，就象我父親走在身邊似的。我父親要是活着，他一定也能背起槍和我并肩走着，我們腳下的土地，應當屬於我們。

我們的人多了，一個排，二個排……，後來我們擴展成了一個連了。為了土地，為了當家作主人，我們不斷地打擊和消滅敵人，壯大自己。

两当兵变

石 磊

两当是甘肃省所属的一个偏僻小县，位于天水—宝鸡之间，东西两边是山，城靠西山根下，城东边有一条河流。城很小又很破旧，只有几家小买卖和小摊贩。城内有几家有钱人，他们穿的是綾罗绸緞，吃的是山珍海味，昼夜花天酒地，作威作福。而广大劳动人民却过着吃糠咽菜，粗布破衣，暗无天日的生活。

1928—1929年，陕西省关中广大地区遭到大旱灾，庄稼枯黄得要死，又飞来满天遍地的蝗虫。瘟疫流行，谣言四起，人心惶惶。官府的苛捐杂税，一天比一天加重，逼迫得劳动人民处在饥寒交迫、水深火热的环境里，被饿死、病死和逼死的人不计其数。人们被逼得走头无路，又不能坐着等死，有些农民们就在夜晚三五成群的向有钱人家抢夺粮食。地主恶霸的武装保家团四出捉人，疯狂地镇压，这更使劳苦农民不能安生。这时青年人就结队成群的夺取保家团的武器，逃往陕西北部，集合成帮，多的有几千，少者也有几百人。他们的口号是：反官府，打地主，为生存，求民主。

国民党十七路军警备第三旅第二团第一营，就是农

民起义军队被收编过去的，驻防在两当县城。统治阶级企图用这支军队镇守关西，防守少数民族的队伍——马家军东进关内和镇压勒索当地人民。我当时就在这个营第三连当二等兵。

这个营的四个连长，都是国民党派来的反动家伙，他们吸士兵的血，勒索当地老百姓，平日无恶不作。但是，大多数的排长都是共产党员和革命的同情者。同时，士兵们多数都是贫苦农民出身，他们都具有坚决反对地主、恶霸、土豪、劣绅的思想。

营长名叫王管三，据说曾是共产党员，他对营里的共产党员不直接捕杀，但他反对部队起义，说什么国民党力量强大，统治严密，我们的力量小，困难多，革命不可能成功。他害怕，动摇，为了谋求富贵——升官、发财，变节叛党，投靠了敌人。但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，由习仲勋同志亲自掌握了这个营，终于发动了两当兵变。

兵变前夕，进行了一系列的周密活动，由习仲勋同志召集了党的骨干分子会议，对部队内的反动势力和进步力量及周围环境进行了详细的分析研究。除营长、连长和个别的排长反动分子外，广大士兵们都同情革命，并且曾经有过行动，他们都是陕西大关中人，普遍有思归情绪，不愿继续南下。同时营内有党的组织领导核心，共产党员的排级军官直接掌握着部队指挥权，又有士兵们的同情和支持，而且两当城防只有这一个营，周围几十里路

以內都沒有駐扎国民党軍隊。這一切都是有利于起義的因素和條件。加以營長一天天露骨的脫離黨，如不當機立斷，部隊里的黨組織和成員就有被破壞和瓦解的危險，因此便決定立即暴動。

1982年2、3月間，氣候還很冷。有一天的夜晚，灰白色的雲彩密布着天空，雖沒有月亮，却也不太黑暗，看樣子似乎要下雨。我們仍旧是照着常規站崗放哨，晚九點鐘熄燈睡覺。這時各個人都把槍枝子彈按規定挂在牆上，脫下自己的帽子，鞋襪，綁帶，按規定放好，脫下自己的破爛軍衣，蓋在陳旧肮脏的軍被上面，睡在鋪墊麥草的冷地上。開始躺下時凍的人們發抖，牙齒直打架，久久不能入睡，可是誰也不敢違犯軍規亂說話。

我睡下以後，凍的睡不着，便回憶起了過去的一切，尤其是想起一年來當兵的不幸遭遇，心里很難過。去年三、四月間，因生活無着，我到柵邑、崑山和鎮一帶去找紅軍，沒有赶上，又沒了路費，路遠不能回家，沒有辦法才到長武縣當了白軍。

當兵時間長了，幾個排長都對我很好，大排長、二排長分別約我和別的許多人結成了同生同死的異姓兄弟。雖然如此，但我還是不願意當白軍，總想去當紅軍，因為紅軍打土豪分土地，為窮人謀利益。可是又不知道紅軍在哪裡，毫無辦法。我經常後悔，覺得自己沒有出息，既然找不到紅軍就應該想盡一切辦法回家去等待時機，為